

# 社会人格与个体人格

## ——林顿人格理论与别尔嘉耶夫人格理论的比较研究

徐 强

**内容提要** 作为文化人格学的代表,林顿主张人格是文化的产物,人既具有与社会价值体系一致的“基本人格”,又具有反映身份群体价值的“身份人格”,但总体上都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拒斥社会对人的奴役,注重个体人格。林顿突出了社会文化对人格的铸造作用,别尔嘉耶夫则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性。前者注重外在环境因素对人格的影响,后者注重人的内在特质;前者注重对当下社会人格的具体描绘和阐释,后者则注重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养成。

**关键词** 林顿 别尔嘉耶夫 社会人格 个体人格

徐 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0023

在西方人格主义理论家中,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 1893 - 1953年)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思想家。他是美国文化人格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侧重于从社会文化视角探讨人格问题。他主张人格是文化的产物,人格表现并反映着文化。不同的文化型态塑造出不同的人格类型,而在同一种文化型态下,个人具有大体相同的人格类型,他称之为“基本人格”。个人除“基本人格”之外,还存在与特定的身份群体相联系的人格型态,他称之为“身份人格”。它们共同组成个人对世界的综合反应结构。而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ola Berdyaev, 1874-1948年)则是20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侧重于从个体精神层面探讨人格问题。在他看来,人类的普遍性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不可重复和不可替代的个体性。人是个体人格,个体人格铸成人这一个谜。人的解放便是摆脱外化、异化和客体化的社会,获得独立的个体人格。林顿和别尔嘉耶夫的人格理论均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对其进行理论比较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西方不同人格理论的了解,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人格问题,弄清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和命运。

在林顿和别尔嘉耶夫的人格理论中,个体不仅是人格的担当者,而且是人格研究的合理出发点。不过在对个体的理解上,林顿和别尔嘉耶夫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作为一位文化人格学家,林

---

本文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格理论研究”(批准号12BKS061)前期阶段性成果。

顿的思想深受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文化人类学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指认了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联,而且转向了人种学的研究,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特定社会的文化模式、个体行为、社会特征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的研究,这就有可能去更深入地探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不同人格的状况以及外在反应。在林顿看来,人格的差异是由特定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社会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个体人格的差异。因此,要了解个体人格的状况就必须先回到他所生活的文化语境之中。他说:“我们必须非常熟悉其他群体的文化之后才能清楚地了解个人行为规范和文化规范,进而作为判断个人人格更深层次的指标。”<sup>[1]</sup>正是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林顿提出了他的“基本人格型”理论,用以说明因不同社会文化而形成的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中共同价值观体系下的人格型态。

在林顿那里,“基本人格型”是指一个社会成员共同的人格因素一起形成的一个紧密结合的综合结构。林顿认为,在同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具有共享的价值体系,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性别有所不同,但是却具有共同的人格因素。“这些共同的人格因素一起形成的一个紧密结合的综合结构,我们称之为整个社会的‘基本人格型’。”<sup>[2]</sup>“基本人格型”相同的社会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理解方式和价值观,并且能够对相关的价值情境作出一致的情感反应。从“基本人格型”的形成不难判断,它不是由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一个社会人们共享的价值体系。如果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引导,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价值体系,对“基本人格型”的形成施加影响。

然而,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相同的社会中,人们仍然会存在明显的人格差异,这表明个体人格中除了“基本人格型”之外,还存在与特定的身份群体相联系的人格型态。个体人格并不只是对社会的共同价值体系的认可,表现为单一的基本人格型态,它还跟一定的身份群体有关,林顿称之为“身份人格”。他说:“我们还将会发现在每一个社会里还有另外的反应综合结构,这些是与社会里某些特定的群体相联系的。例如,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男人、女人、少年人和成年人等有不同的反应综合结构的性质。在一个阶级社会,类似的差异可以从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个人身上察觉到,比如贵族、平民和奴隶。这些联系于身份的反应综合结构可以称作‘身份人格’(Status Personality)。”<sup>[3]</sup>可见,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个体身上都有两种反应的综合结构,即“基本人格型”和“身份人格”。“基本人格型”是个体身上体现出的社会共同性特征,而“身份人格”则是个体身上体现出的个性化特征,它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一旦一个人的身份得到提示,社会成员就能够进行成功的交流和互动。既然个体身上具有“基本人格型”和“身份人格”双重人格型态,那么它们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呢?林顿认为:“任何社会认定的身份人格是添加于基本人格之上,并与之相融合的。不过,它们与基本人格的不同之处在于格外偏重特定的外在反应。这种偏重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要问是否能说身份人格包含与基本人格不同的价值观体系。”<sup>[4]</sup>这意味着不同的身份群体既分有着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又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观体系,并且在其影响下形成特定的反应模式。通过一个人的言行,我们大体可以判断他的身份群体;同时通过他的身份群体,我们也可对他的言行有所期待。

与林顿把社会与个体人格相关联、肯定社会对个体人格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别尔嘉耶夫则极力拒斥和反对社会对个体人格施加的影响。他把社会与个体对立起来,认为个体人格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它只与个体有关,个体只有保持人格的独立性,不受社会的强制,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社会作为外化、异化和客体化的存在不仅不能积极作用于个体人格,相反,它只会使个体遭受种种奴役,使个体人格受到扭曲。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一个人要想有尊严地活着,就必须保持自身的个体人格。“即使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个体人格也支撑着他们的最高存在的形象,万万不能将他们所拥有的生存意义上的核心——个体人格,转换为工具。”<sup>[5]</sup>在这里别尔嘉耶夫从生存论的意义上确立了人的不可

[1][2][3][4]拉尔夫·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文化、社会与个体关系之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第102页,第102页,第102-103页。

[5]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剥夺的权利和尊严,确立了个体人格以及与个体人格相关联的个体人的自由、精神、主体和爱等等的最高地位和价值。别尔嘉耶夫并不否认人的社会性,他说:“具体的人是社会的人,不能把人从他的社会性中抽象出来。”<sup>[1]</sup>只不过他不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来说明人的社会性,而是阐明了人的这种不可摆脱的宿命对于人的消极影响和作用。人既是社会生存,也是个体生存。作为社会生存,人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奴役,受到压制;作为个体生存,人又具有自身的独立和尊严,不能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甘愿接受社会的模化。他说:“人的纯粹的社会性即人的社会性的完全抽象,这会把人铸成抽象的生存。剖析人时,视人为纯粹的社会生存,也就把人放在了奴役的位置上。”“具体的人不是被决定的人,而是自由的人。那些热衷并受限于自己的社团、政党和职业的非个体性提拔的人,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sup>[2]</sup>

别尔嘉耶夫之所以将社会与个体对立起来,是因为他把人看成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矛盾生存:人首先是肉体存在,为了生存必须追求物质利益,介入社会,因而难以摆脱社会的奴役;人同时又是精神存在,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不甘于受奴役和支配。“具体说,人悬于‘两极’: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sup>[3]</sup>对于个人来说,就必须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有所认识,并且做出回应和选择。一方面“人的社会化致使人贬为部分,致使人无法拓展深层面上的个体人格和良心,无法开掘生命的源头。日益扩展的社会化围剿着人的深层面上的生存,鲸吞着精神生命。”<sup>[4]</sup>另一方面“个体人格要首先审视人的这种悲剧:人不再作为个体性的生存而生存着。于此,奴役的孽根是客体性。客体化是践踏个体人格价值的统治的形成。正是人的本性的客体化、外化、异化,人才受到强力意志、金钱、贪欲、虚荣等的奴役,个体人格才受到致命的伤害。”<sup>[5]</sup>作为肉体生命,人必须生活于社会中,并且受客体化的社会所制约,结果造成对人的深层次的精神生命的伤害和奴役。因此,人只有克服重重障碍,想方设法持守自己精神生命的存在,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存在。

别尔嘉耶夫认为,在长期的社会统治中形成了普遍——共相的事物对个别——殊相的事物的奴役。人若放弃反抗等于放弃自我,只有实现对人的个体人格的坚守才能使人避免这一悲剧。他说:“遏止人的这一悲剧,抗争人的被奴役,唯有通过个体人格实现自身的生存和自身的命运。这种实现,置于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多与一、必然与自由、外在与内在的既结合又对立之中。”<sup>[6]</sup>

可见,别尔嘉耶夫反对个体在人格上向社会的屈从,它是个体独立的人格,不应受社会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人只有持守自己的“个体人格”,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别尔嘉耶夫和林顿的观点差异,实则反映了他们思维路径的不同。林顿的观点突出了社会文化对人格的铸造作用,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则强调了个体的独立性。相比较而言,林顿是在现实层面对人格的具体阐释,别尔嘉耶夫则是在精神层面对人格的期许。对他们的思想需要辩证地加以分析和理解。

## 二

作为差不多同时代的思想家,林顿和别尔嘉耶夫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世界大战,他们都关注个体的处境和命运,都从个体出发,并试图寻找到有关人格问题的合理解释。这是他们理论的共同之处。但是,由于站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上,他们的思想又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具体来说:

首先,在对人的理解上。林顿更侧重于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待人,把人看成是“文化人”;而别尔嘉耶夫则侧重于从精神角度看待人,把人看成是“自由人”。从前者的角度来看,人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人的改造首先是文化的改造,人格的塑造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塑造。因此,“文化必须被视为各社

[1][2][3][4][5][6]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第79页,第3页,第33页,第33页,第33页。

会建立人格类型及社会特有的各种身份人格系列的支配因素。”<sup>[1]</sup>当然,林顿只是把文化当成是人格的支配因素,而不是惟一因素,除了文化的因素之外,还有个人生理决定的潜能和与他人的关系等。文化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平均的、正常的个人人格,而非文化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特定人格综合结构。此外还有超乎正常人格差异范围的特异人格,它的形成部分与个人早期环境与经验的意外事件有关,部分与基因有关。但总的来说,人格的状况主要取决于文化的状况。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虽然人的肉体生命受制于社会,但人的精神生命却应超越于社会。别尔嘉耶夫不承认个体人格与社会有何关联,虽然个体不得不存在于社会之中,但是,个体人格却总是遭受着社会的压制,“身临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个体人格的生存不能不痛苦万状。”<sup>[2]</sup>他认为文化应更贴近人格和精神,但是,现实社会中文化却堕落了。文化氛围导致人们成为虚幻的幽灵似的生存物,文化人沦为文献的、技巧的奴隶。文化总用自己的价值和成果诱人,总企图永远置人于客体化世界中。因此,他试图借助个体与上帝的精神交会,实现人的提升,从而摆脱外在的奴役性生存,达到内在的自由解放。他说:“个体人格——上帝,不想充当人的统治者,它提升人,荣耀人;个体人格——人,应成为上帝的荣耀,感领上帝的恩泽,回应上帝的召唤,与上帝进行爱的相遇。”<sup>[3]</sup>可见,林顿从文化出发,更注重人格的共性、普遍性,试图从一般的文化模式中去把握和理解人格;别尔嘉耶夫则从个体出发,更注重人格的个性、特殊性,试图从独立的精神层面去把握和理解人格。

其次,理论基础不同。作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林顿是在文化人类学基础上来建构他的文化人格学的。因此,他的人格理论总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格。一旦脱离了文化,我们就难以理解人格。别尔嘉耶夫的理论基础则较为复杂,既有存在主义、宗教学思想,同时又有社会主义的情结。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使他确立了以个体人格为其理论核心;他的宗教学思想,使他把与上帝的见面交会当成是个体人格确立的手段;他的社会主义情结,使他关注人的现实处境和命运。但总的来说,别尔嘉耶夫更注重人的精神的独立和自由、超越和提升。他极力反对人受世俗社会的奴役,主张通过个体的信仰,从上帝那里获得动力,完成自身的精神蜕变,实现自我救赎。作为一位宗教学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从不讳言他的宗教信仰。在他看来,宗教是直接关乎人的精神的,而人的解放从根本上来说是精神的超越。因此,他的理论始终与宗教息息相关,并且借助宗教来促成个体人格的形成。

第三,理论视角不同。林顿和别尔嘉耶夫都把入放置到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只不过他们理论分析的视角却截然不同。林顿是从社会的视角来分析人格问题,而别尔嘉耶夫则站在个体的角度来看待人格问题。在林顿看来,虽然人格以心理反应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的形成却直接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人们始终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中,不管人们是否接受和认同,社会文化都会在个体的“基本人格”和“身份人格”中有所反映。而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个体人格属于精神层面,它与上帝有关;社会属于客体层面,只会造成对人精神的压抑。他把人的生存、自由与客体化对立起来,认为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客体化过程,就是人遭受奴役、失去自由的过程。社会对人意味着的只是奴役,不是自由。因此,他极力拒斥社会,要求人们持守个体人格。个体人格的形成与社会无关,“它拥有自己的家园,它来自另一个世界。”<sup>[4]</sup>它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在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和精神创造中才能形成。可见,在人格问题上,林顿所持的是社会人格的立场,别尔嘉耶夫所持的则是个体人格的立场。前者承认社会即文化对人格的塑造作用,后者则把人格看成完全独立于社会的。

最后,个体解放途径不同。林顿接受和认可社会,他承认人格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

---

[1]拉尔夫·林顿:《人格的文化背景——文化、社会与个体关系之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2][3][4]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第19页,第4页。

把人格的塑造与文化的改造结合在一起,反对离开一定的社会文化抽象地谈论人格问题。在他看来,虽然性别与遗传对人格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人格具有决定作用的则是文化。他的理论指向是对社会文化的认同。因此,一方面我们尊重不同的人格就应尊重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差异反映着人格的差异;另一方面对人格的改造首先是对文化的改造。人格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积淀,社会与家庭、文化与亚文化的变化才能最终引起人格的变化。别尔嘉耶夫则反对社会,他不仅不认为个体人格应与社会相关,而且把社会看成是个体遭受奴役的源泉。主张通过个体精神的升华达到对个体人格的自觉,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和精神自由。在他看来,“人自身的个体人格朗照着人。它是人的最高本性和最高使命。一个人纵然横遭压抑,磨难不已;纵然沉疴在身,不久人世;纵然只存于一种可能性或者潜能中;但重要的是万万不能没有个体人格。人一旦没有个体人格,也就混同于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失掉人自身的独特性。”<sup>[1]</sup>正因为如此,他极力想通过个体人格的培植来实现人的救赎,进而确立人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地位。人不能只甘于做一个个体的人,而是要做一个具有个体人格的人。“个体人格是自由,它卓然独立于自然、社会、国家。个体人格的自由迥然异于个体人的利己的自我确定。”<sup>[2]</sup>只有拥有个体人格,才能使人在同世界发生关系时持守住自己的独立和尊严。

总之,在有关人的问题上,人格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林顿和别尔嘉耶夫向我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理解模式,这既反映了他们对待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心态和文化背景。

### 三

作为一位纯粹的研究者,林顿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背景,是对个人人格单纯理论上的分析。在他的理论视域中,人、文化和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把人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人格的含义。林顿试图通过对文化的解析,来说明现实生活中个体的人格问题。对文化的认识,是认识人格问题的切入点。在他看来,人格问题不只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解决人格问题也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实现文化转向,才能实现人格型态的根本转变。由于个人、文化和社会的关系异常复杂,我们也不能使用实验室和计算尺等通常的科学研究手段,这就使得寻找适合的研究技术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困难。在林顿看来,这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与林顿相比,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形成要复杂得多。别尔嘉耶夫既是一位理论家,又是一位革命家。他的思想既受到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不同思想家的影响,又有宗教唯心论的基础,同时还有来自对现实的考量。他声称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位学院式的哲学家,从来就不想使哲学远遁生活而成为抽象的东西。他曾明确表示:“就我的哲学生存来说,它不仅企盼认识世界,也企盼变革世界。”<sup>[3]</sup>别尔嘉耶夫一生经历了多舛,其中两次世界大战,另外则是1905年与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在20世纪,他还经历了俄罗斯的精神文化的复兴阶段,经历了俄罗斯的苏维埃统治,体认了整个欧洲文化的危机,目睹了中欧的动荡不安、法国的沦陷、德国军队的掠城等等。因此,“哲学家面临历史剧变,即精神进行重大转向的时期,不可能再羁绊于书斋、书本,不可能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不可能不感悟到精神的挣扎。”<sup>[4]</sup>他亲身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既对俄国社会人民的处境有充分的了解和同情,又对社会主义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有切身的体会。这使他常常陷入矛盾和困惑之中。他坚信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是精神世界,一是世俗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使人独立和具有尊严,但却受到世俗世界的挤压。人在世俗世界中受到客体化的社会的奴役,遭受痛苦和不幸。所以他既关心个体精神方面

[1][2][3][4]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第16页,第1页,第1页。

的提升,又关注个体在世俗世界的处境。他说:“我既热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受难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常在我的内心里冲突着。”<sup>[1]</sup>正是基于对人的双重认识,他认为必须寻找到使人能够在两个世界中均获得解放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对个体人格的强调。他说:“人不仅应向上超升,出俗不染,也应向下观照,同情怜悯尘寰中的一切。在精神的与理性的道路上,我走了一程又一程,个体人格是我最终所领悟到的真理。”<sup>[2]</sup>别尔嘉耶夫之所以如此重视个体人格,是他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上,从个体的生存和自由出发,反思人在社会中的客体化所造成的对人的全面压制和奴役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最重要的基石和最核心的思想是:客体化与生存、自由的相互对立。”<sup>[3]</sup>他认为只有个体人格才能使个人身在客体化的社会之中却依然能够保持精神的独立,不被社会所同化。他把他的这一有关个体人格的理论称之为“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说:“由于沉思和信仰,社会主义伴随我生命的全部里程。我把这项真理称为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迥异于占优势的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其区别即在于:前者的基础是个体人格高于社会,后者的基础是社会高于个体人格。”<sup>[4]</sup>别尔嘉耶夫关注的理论焦点始终是个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因此,他一直把社会主义当成是一项正义的事业。这是他把他的理论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又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对人的精神的忽视以及把社会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做法,所以,他要用人格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通过人的精神超越来实现人的现实解放。

撇开个人的理论背景和生活经历不谈,林顿和别尔嘉耶夫人格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们对待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认识上的分野。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个人与社会既相联系又相对立。林顿侧重于从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性上,强调个人脱离不了社会,跳不出社会文化的圈子。他主张一定的社会价值体系塑造着个人,并将个人纳入到特定的社会规范之中;而别尔嘉耶夫尽管承认个人离不开社会,但他侧重于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性上,强调个人应避免社会化、客体化,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既不屈从于社会,保持个体的人格独立,又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保持一定的人格张力,为个体人格的养成提供空间,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深思的问题。

从上可知,林顿注重外在环境因素对人格的作用,别尔嘉耶夫注重人的内在特质;林顿注重对当下社会中人格的具体描绘和阐释,别尔嘉耶夫则注重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养成。林顿认为个体人格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人格中包含着文化的内容,别尔嘉耶夫则认为个体人格的形成与社会无关,只有个人摆脱客体化的社会,实现精神的超越和自由才能形成个体人格。总的来说,林顿的人格理论更符合人的实际存在状况。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的社会之中,因而个体人格的形成不可能与社会无关。不过,林顿过于强调文化在总体上对人格的决定作用,容易模糊人格的真正决定因素。别尔嘉耶夫的人格理论则带有很强的理想性和宗教色彩,但它对个体人格和精神超越的重视对我们认清人格问题、处理个体自由与社会奴役的关系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人格始终是人的人格,它是社会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根结底,它要受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制约。因此,只有立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我们才能认清人格形成和发展的真正根源,不仅对人格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寻找到解决人格问题的现实途径。

[责任编辑:曾逸文]

---

[1][2][3][4]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第3页,第4页,第8页。